Transtext(e)s Transcultures
Journal of Global Cultural Studies

3 | 2007
Global Cities

空间、 身体、女权: 中国都市女性写作

Shelley Chan (陈颖)

Édition électronique
URL :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transtexts/136
DOI : 10.4000/transtexts.136
ISSN : 2105-2549

Éditeur
Gregory B. Lee

Édition imprimée
Date de publication : 1 septembre 2007
Pagination : 43-51
ISSN : 1771-2084

Référence électronique
Shelley Chan (陈颖), « 空间 、 身体 、女权: 中国都市女性写作 », *Transtext(e)s Transcultures* 跨文本跨文化 [En ligne], 3 | 2007, mis en ligne le 15 octobre 2009, consulté le 30 janvier 2024. URL :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transtexts/136 ; DOI : https://doi.org/10.4000/transtexts.136

Le texte et les autres éléments (illustrations, fichiers annexes importés), sont « Tous droits réservés », sauf mention contraire.

空间 、 身体 、女权：中国都市女性写作

陈颖 SHELLEY CHAN

Chinese women have been continuous hits in mass media throughout the past decade. While names such as Mian Mian and Wei Hui have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readers with their *fin de siècle* decadent writings, or, "genital writings" as labeled by some critics, Mu Zimei, Zhuying Qingtong and Sister Lotus have excited netizens with their online sex diaries, hawking details of one-night stands, nude self-portraits, and pictures of flirtatious gestures respectively, which have caused far greater disturbances in China.

On top of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se writers have bravely subverted the sexual hierarchy and avenged traditionally oppressed Chinese women or if they have willingly commercialized and objectified the female body, this article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notion of privac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ity and examines the complexity of privacy and publicity intruding upon one another in literary space. It proposes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as experienced a metamorphosis from an invasion of the private space by public space, specifically Maoist discourse,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s to an intrusion of the public space by private space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et in capitalistic-communist China.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what the bad girl writers and bloggers have done would have been a revolution to celebrate the renaissance of the hidden and suppressed body in the traditionally male-orientated Chinese culture and a new representation of feminin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women. However, the body, intentionally used as the selling point of the works, has been objectified, marketized, and thus turned into a production of capitalist consumerism. As a result, instead of discovering th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the female body serves to signify a re-entrapment of femininity by male chauvinism.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冒起的王朔，以一副小混蛋、坏男孩的面目出现，大肆调侃正统意识形态而引起文坛震动。尽管褒贬不一，但足以让文坛兴奋了好一阵子，形成了名噪一时的“王朔现象”。至上世纪末，中国文坛变成了“坏女孩作家”或曰“美女作家”的天下。她们的开山祖师是上海女子棉棉与卫慧，前者以其《糖》等自传体小说引起注意，后者赖以成名的《上海宝贝》也是自传小说。后来又出现了九丹的《乌鸦》与春树的《北京娃娃》等。再后来，更有木子美的网上日记《遗情书》。如果说王朔小说里的犬儒还有正统作衬托，美女作家的作品根本就不屑顾及正统意识形态。她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身体与个人经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赤裸裸的颓废。

后毛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变化速度惊人。回顾文革刚结束之际，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之所以能够惊世骇俗，是因为篇中描写了当时的大忌：爱情，而且还是婚外情，更有甚者，是两个共产党员的婚外情。故事的男女主角相爱廿多栽，但因男方是有妇之夫而不得结合，尽管他的婚姻是建筑在责任而非爱情之上的。作者大胆地挑战传统观念，提出了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这一命题，指出女性宁可独身也不要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所困，更无须顾忌旁人的闲言碎语。然而，尽管此篇小说在当时可谓震聋发愦，但在描写上始终没有打破身体禁忌。男女主人公二十多年来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二十四小时，两人连手都没有碰过。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二十多年来，女性写作一再令读者觉得耳目一新，同时也屡屡引起争议，主要原因是她们对身体禁忌的挑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安亿就以其“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 中的大胆描写而轰动一时，成为女作家里敢于打破禁忌的先锋人物。到了九十年代，林白和陈染进一步细腻地描述女性的身体觉醒和性心理，甚至还勇敢挑战传统，开发了女同性恋文学这一新领域。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这一角色，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异性与同性爱，最后似乎更能认同的是后者。在《私人生活》以及客居英国的作家虹影的《背叛之夏》中，都涉及了革命与性这一命题，而且不约而同地写的都是 1989 年夏天的北京民运。虽然读者和评论家对她们的作品有争议，但是这些小说始终没有跨越严肃文学的范畴。

棉棉与卫慧的出现，标志着新一代女性作家的崛起。她们的作品里充斥着大量的性爱，毒品，妓女，自杀等等，形成了一幅世纪末颓废图。王安亿、林白、陈染等人探讨的是女性的身体经验于她们成长经验中的重要作用，而那一批“坏女孩”作家则流于完全为性而性，为颓废而颓废了。《糖》写的是摇滚乐手的另类生活与精神世界，里面不乏滥交、吸毒的场面。《上海宝贝》的女主角在爱着性无能男友的同时，也享受着与德国情人的性爱，全书充满了物质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的痕迹。九丹的《乌鸦》讲述在新加坡的女中国留学生不顾一切地想办法留在新加坡，甚至不惜沦为暗娼的故事。春树写《北京娃娃》时只有十八岁，书中直露地讲述了一群与作者同龄的另类青少年的生活，特别是他们对待性的随便态度。时至 2003 年夏，广州某杂志编辑木子美

更上一层楼，在其博客上以日记的形式公开自己的一夜情经验，成为全国的热点话题，据说她的博客达到了一千万的日点击量纪录。后来她更把那些日记印刷成书，题为《遗情书》。假如从广义上看待写作 / 创作，原广州中山大学讲师竹影青瞳也应归入这一组坏女孩当中——她在网上公开展露自己的裸照从而一夜成名。当然后来更有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式“美女”，例如安尼宝贝，芙蓉姐姐，流氓燕等等，数不胜数。

评论家彼得·布鲁克斯认为：“色情的身体既激活了社会，同时也分裂了社会。”[1] 坏女孩作品中充满欲望的身体正好引证了此一观点。“坏女孩现象”出现以来，批评界乃至公众的反应分歧甚大。认同她们的人称赞她们为女性解放的先锋，女权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因为她们勇于宣扬女性的身体欲望，占据了一贯以来由男性占主导的空间，例如出版和科技领域。过去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对身体的描写，例如《金瓶梅》及《肉蒲团》等，但那都是由男性作家来描写女性身体的，现在则是女性对自身的展现。 但另一方面，她们的反对者则从捍卫道德的角度出发谴责她们，称她们为妓女作家、文学慰安妇、拥有哈佛学位的潘金莲等等 。本文拟以空间和身体写作的角度为出发点，探讨“坏女孩现象”究竟是否女性主义在男权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打的一场胜仗。

后毛时代的男作家，特别是寻根作家，往往通过描写乡野生活来寻找民族之根，表表者如莫言、刘恒、韩少功、贾平凹等，而女性作家则多注目于都市或城镇。城市里孤立、疏离的有限生存空间，为她们提供了叙述现代女性身体经验、展示身体欲望的良好舞台。陈染的《私人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角倪妞妞的成长故事， 她的异性爱与同性爱，基本上都在她居住的公寓楼或别的室内空间里发生。到最后，极端孤寂的她陷入自闭状态，完全与世隔绝，普通的家居空间于她来说已经过大，她干脆搬进了浴缸里生活。只有在浴缸狭窄的空间里她才有安全感，因为浴缸的四壁让她感到重归母体。

本文讨论的几位美女作家无一例外，都来自大城市。城市里人际关系的疏离，一方面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漠，另一方面又让人的隐私成为可能，但同时也刺激了对于他人隐私的好奇心，培养了一种偷窥欲。彼得·布鲁克斯指出：

> 小说的兴起与隐私这一概念的诞生密切关联，……而隐私的概念又与现代化城市的崛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家庭内部的建筑结构，从中世纪群居部落式的生活、进食和睡眠的空间转化为十八世纪上层社会与中产阶级定界分明的私人公寓、闺房、内室、壁橱等，在在反映出隐私观念的强化。……与早期的文艺表演

[1] 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著,《身体作品：现代叙述里的欲望对象》[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剑桥， 麻萨诸瑟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 年，页六。

> 不同，小说不需要观众的参与。小说的读者只为自己默读，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隐私的价值观。

他还指出：“小说一开始就把私人生活和私人经验作为经常描写的题材。”[2] 可以说，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吊诡：小说的兴起强化了隐私观，而小说题材对私人生活的兴趣及披露，却又削弱了、甚至侵犯了私人空间。

美女作家的写作，在中国社会这一特殊文本中造成了一次有趣的空间互换。众所周知，在毛时代，私人空间是被公共空间无限侵占的。准确地说，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私人空间存在。个人的所有活动都在政府的监管范围内，像结婚、离婚这样纯粹个人的事情，也要得到组织的批准才合法。此种对私人空间的侵略在文化大革命中尤其严重。那时，对毛的个人崇拜及革命狂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的肖像、语录，以及各式各样的宣传海报成为每一个家庭不可或缺、也是唯一允许的装饰品。就像我们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中看到的，在文革中举行的婚礼上，所有来宾的礼品无一例外是红宝书或毛画像，以至这些对新人未来生活毫无实用价值的东西堆积如山，但又不能像其他垃圾一样丢弃，因为这不但会惹出麻烦，严重时甚至会招致杀身之祸。婚礼上的全家福合照以毛的画像为背景；新郎新娘以及来宾在婚礼上齐声高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新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日子完全被无处不在的公共空间意识形态所控制。另外，人们的日常娱乐生活也全被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以及有限的几部革命故事片霸占，以至人人耳熟能详，到了能够统一人们生活步骤的地步。例如，《东方红》变成了早上叫人起床的闹钟，《大海航行靠舵手》宣告会议结束，而《国际歌》则标志着一天的完结。毛话语的极度渗透使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侵犯达到极至。

二十世纪末以来坏女孩们的所作所为正好相反。她们的写作把最私隐的变为最公开的，以她们的私人空间进驻甚或侵扰公共空间。棉棉、卫慧、春树等人的作品，都是自传或半自传性质的，比起“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的小说，她们书写中的自我参照成分，使所有含糊的能指都有了确定的所指，也就是说，女主角的身体欲望及其私生活的公开，清晰地指向作者本人，使读者的想像有了一个无须假设的聚焦点。到了木子美的网上一夜情日记，以及竹影青瞳的自拍裸照，干脆就把作者本人的身体以文字或影像的方式公开示众。以把最不可见的转化为可见的这样一种方式，这批坏女孩一方面满足了大众的偷窥欲，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扩张了，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线。当有人谴责她们对公共空间的污染时，她们则认为是她们的领地被侵犯了，因为她们把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公众范畴视为自己扩大了的私人领域。木子美在其《遗情书》的序里就有以下看法：

[2] 参看彼得・布鲁克斯，《身体作品：现代叙述里的欲望对象》，页 28－30。

> 如果不是因为木子美在 Blogcn 的私人日记《遗情书》引发意外事件，我会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这种生活由伤害与被伤害、自立与不自制、幻想与真实组成，在有限的年纪经历极限，在日常化中戏剧化，在个体生命中分裂多重角色是我的追求。但是，我被干扰了。卷入道德是非、价值判断甚至男权女权的讨论中。本来，任何标签对我都是无意义的。[3]

干扰与被干扰的界定，其实就是对空间的争夺。如果说革命时代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占有是单向的，是一方面强加于另一方面的，那么后毛时代的反方向侵占，则是双向的。美女作家肆意向公共空间扩展自己私人领域的同时，作为公共空间组成部分的大众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读者及网民受到公开邀请涉足作者的私人空间，窥望作者的隐私，强烈的好奇心竟然如此轻易地得到满足，于是人人趋之若鹜，使作品的销量和博客的点击量直线上升，无形中帮助了私人空间对公共空间的侵略。有人会认为，读者或网民只要不购买那些书籍，不浏览那些网页，其实就等于选择不被干扰。然而，经历了极度禁闭的革命时代的中国大众，正惊喜地体验着西方世界传过来的各种新奇事物，例如性开放、互联网等。这种前所未有的缤纷繁杂，渗透力丝毫不比毛话语弱，而诱惑力又绝对比毛话语大。换句话说，完全不被干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公共空间一般都被视作男性话语权所主宰的领域。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妇女地位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论，更使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妇女在很大的程度上向男性看齐。然而，传统男性中心的观念依然顽强，毛的名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4] 归根结底还是以男性的标准作为衡量女性的准则。上至女性中央委员的姓名后要冠以一“女”字，下至“女作家”、“女医生”、“女工程师”之类的称谓，都充满着潜意识中的性别歧视。所谓男女平等，往往只停留在女性婚姻自主、经济独立、有同等权利接受教育等较为表面的层次上，虽然这些权利已经来之不易。女性意识及其身体欲望，基本上还是被忽视，甚至被压抑的。女性的身体，自古以来都只是传宗接代以及供男性享乐的工具。女性从来都被剥夺了性的权利，不可以理直气壮地坦言自己的身体感受，否则便会被贴上“淫荡”的标签。从此一角度看，一代坏女孩的崛起，尤其是以木子美为代表的女性博客写作，似乎为此空间带来了女性的声音，或可视为女权对男权空间的占领。相对于传统道德规范而言，“坏”本身就是一种越轨，一种挑战，一种颠覆。

究竟这些坏女孩的行为是颠覆了男权高高在上的性别金字塔，使千百年来饱受歧视的中国女性扬眉吐气，抑或是根本就掉进了男权意识的窠臼里，有意地把女性身体商业化与物化，使其成为男性欲望的目标？ 以发表裸照一炮而红的竹影青瞳这样评价自己：“我视自己的

[3] 木子美著，《遗情书》“自序”。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3 年，页 1 。
[4] 《毛泽东主席论妇女》， 页 18。

裸体为大自然的一件作品。”[5] 她还说：“为什么我要觉得羞耻？我自拍裸照是出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我想看看自己可爱的外形，也让别人看看我。”[6] 木子美也有惊人名言：“要采访我，必须先和我上床；在床上能用多长时间，我就给你多长时间的采访。”[7] 她更在其博客上自曝与某著名歌手的某次性爱狂欢，并公开歌手的名字。象她们这样坦然面对自己的身体，公开点评男性身体，的确挑战了传统加于女性身上的行为准则，置换甚至颠覆了男女的传统位置。

有论者这样认为：

> 一直以来女性文学在女权主义中占有及其重要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都将女性写作作为考量女权主义发展的参照系，所以女性主义文学很自然地从女性写作跳入了女性话语圈中。在中国，人们对女性文学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女性主义本身。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从女性创作的文本中来审视中国女性逐渐清晰与不断增强的女性意识。从张洁、谌容到王安亿再到林白、陈染、海男再到卫慧、绵绵［棉棉］以及在网络新环境下出现的诸如安尼宝贝、木子美等女性写手，虽然写作情境、写作内容和写作方式都孑然不同，但是她们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写就的作品，无疑都成为女性主义的文化符号，在之其中，女性写手们试图营造一种话语体系来不断强调自己的文化性别与精神性别。[8]

网络社会就是实际社会的翻版，从各种游戏到色情网页，在在都反映出性别歧视。有鉴于此，此位论者特别强调了网络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从网络女性主义传播的角度来看，‘木子美们’极其技巧地利用了网络媒体这一平台，发出了属于女性自我的声音。”[9] 同一位论者还有以下的看法：

> 就博客这一网络空间来看，它属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交集。……在女权主义对现存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有一种被她们称为“领域划分”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公共领域是男人的活动领域；而私人领域才是女人的活动领域。……不少人认为男性在网络空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包括网络的技术性、娱乐性都证明网络是更适合男性的公共领域。但是博客改变了这一状况，它为那些原本在现实社会中处于男权制困禁下而不愿发出声音，但同时又具有话语叙说欲望的女性提供了倾诉的话语场。……女性借助于博客“私人化”的特性，丢掉了

[5] 参看网页 www.ing7.net/inf/2004/feb/21/text/inf_3-1-p.htm。原文为英文。
[6] 参看网页 http://english.people.com.cn/。 原文为英文。
[7] 参看网页 http://biz.icxo.com/develop/mzm.jsp。
[8] 陈佳，“从‘木子美’现象看博客网对女性话语空间的拓展”，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28296.html，页 2。
[9] 同上，页 1。

> 原有的束搏和拘谨，使自己的话语在公共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10]

彼得・布鲁克斯相信：“身体是社会和语言的建构。”[11] 在围绕着坏女孩作家及其作品的辩论中，身体是一不容置疑的中心点。九十年代林白、陈染等作家对女性心理、生理成长的书写，就被贴上了“私人化”及“身体写作”的标签。到了坏女孩们，“身体写作”更是评论家口中频频出现的词汇，更有甚者，是“器官写作”、“下体写作”，不一而足。在西方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领域里，“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把身体纳入写作自始至终是文学的基本考虑；相反地，把写作赋予身体是把物质的身体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体的尝试。”[12] 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身体是符号象征的本源、原始自恋意识的对象，也是婴儿发展求知愿望最原始的探索园地。[13] 女性主义者着重的是身体对女性主体意识的重要意义。巴赫汀的狂欢理论则强调世俗身体在颠覆中世纪黑暗的神权统治的中心意义与作用。[14] 然而，“身体”一词在中国文化这一文本中从来都被强迫扮演不那么光彩的角色，这是由于身体与性有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里，身体似乎仅仅与性有关。既然性在中国从古到今都是一大禁忌，身体也就自然地带上一层暧昧、色情的色彩。不论是儒家“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还是革命时代禁欲的意识形态，性与身体都是讳莫如深的。至于很多人提及的身体写作，就是在对身体的这一理解层面中衍生而成的，其实是对西方文学批评及女性主义意义上身体写作的误解。后毛时代的中国，传统孔教以及毛话语对身体的禁忌都逐渐淡化，随之而来的是身体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被赋予的新意义，这种新意义带有浓厚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色彩。

表面看来，女性的身体由女性来阐述，是赋予了身体一种自主权，把身体从男性话语中拯救出来了。问题在于，女性在此过程中究竟是获得了还是丢失了自我？坏女孩们的自白也许能给我们提供答案。九丹就有这样的宣言:“要夸奖一个女人,莫过于说她是妓女。”“宁当‘妓女作家’，不做‘美女作家。”[15] 当九丹被问及是否把自己当作“美女作家”时，她有以下的回答：

> 至于一个女人长得好看不好看，除了她自己和她的同性有个基本的评价之外，更多的要靠男人去评价。因此够不够美女的标准，就由那些见过她们的和与她们打

[10] 同上，页 4。
[11] 彼得・布鲁克斯，《身体作品：现代叙述里的欲望对象》，页 7。
[12] 同上，页 1。
[13] 参看梅莲莉·克拉恩（Melanie Klein）著,“俄狄蒲斯冲突的初级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s] ，收于*对精神分析学的贡献，*1921 —1945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1921-1945], 伦敦：赫格斯出版社， 1950 年, 202-226.
[14] 参看米哈尔·巴赫汀著，*拉伯雷和他的世界*［Rabelais and His World]. 布鲁明顿：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1984。
[15] 以上两句引言均出自 www.women.sohu.com/58/22/blank215572258.shtml, 页 1，页 2。

> 过交道的甚至和她们睡过的男人去评价吧。[16]

木子美也宣称：“我的‘邪’表现在我老去诱发男人的邪恶。”[17] 妓女是以身体为商品的职业。当一位女性以自己的身体被男性消费为荣，当一位女性美貌与否必须由男性来判断，又或者当一位女性的某种特质必须与男性的同一特质并存才能显示的时候，这位女性无疑是男权主义的附属品、牺牲品。一旦她们把对自我的发掘与显现置放于以男性意识为依皈的性别结构中，女性意识即丧失殆尽，自我也就不可能获得，而只会迷失在男性的价值判断系统中。

任何写作，包括女性写作，都应该放在社会现实的文本中检视。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假如我们要获得对女性创作充分而真实的认知，就必须把她们的写作放在社会的文本中阅读及理解。”[18] 改革开放，使中国对西方敞开大门，计划经济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越穷越光荣的理论早已过时，当今中国社会是极度追求经济消费的社会。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身体与消费所产生的关联，使“所谓美女不是物理性的，而恰恰是经济性的。”[19]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几乎成了万事万物的决定因素。同时，传统对身体的禁忌也被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化，尤其是荷里活电影动摇了根基。看准了这一大好时机，坏女孩们抓紧机会，促销身体，从中谋取名利。正如论者他爱批评的那样：

> 美女作家惯于以自己的身体做广告，努力开发自己的身体，源源不断地吸纳外部资金才是她们真正的追求，而文学成了她们谋求一夜扬名从而终身暴富的手段，文坛成了她们战旗猎猎的赛马场。她们以自身那几乎荡然无存的廉耻为代价，以身体为赌注举行着异常激烈的赌博，以文学的名义叫卖身体。[20]

以身体为卖点，这些美女作家确实把握了市场的命脉。这群作家中年龄最小的春树对性

---

[16] 九丹著，“一本关于罪恶的书（代序）”，*乌鸦：我的另类留学生活*，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年，页 6。
[17] 同上，页 2。
[18] 安·露丝琳·琼斯（Ann Rosalind Jones）著，“书写身体：对女性文学的理解”[Writing the Bod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écriture féminine]，收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文集*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纽布林斯威克：鲁爵斯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页 367.
[19] 孙健敏，“从身体解放的尽头重新出发”[Starting again from the End of Body Liberation]，刊于*花城* [Floral City]，2004 年第 6 期，页 184。
[20] 他爱著，*十美女作家批判书*，华龄出版社，2005 年，页 4。

有这样的看法：“用一个口号来说吧，就是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21] 卫慧也宣称：

> 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兴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22]

在中国，恐怕没有什么比年轻女作家公开谈论性高潮更刺激神经、更蛊惑人心的了。不难想像，她们轻易地拥有了大批读者，达到了无论是书的销售量还是博客的点击量都十分可观的目的。

总而言之，近十年来的中国都市是女声喧哗的十年。坏女孩或曰美女作家既引起了社会的不安，也赢得了掌声。她们的写作本来具有挑战传统性别权力、复兴被压抑的女性声音的革命意义，有潜力成为新女性意识的代表。然而，急功近利的投机心态使她们的身体写作沦为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产品，以至身体、私人空间及女性意识都完全地商业化。女性身体非但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反而再一次而且更深地被物化，成为男权消费的对象。诚然，这批美女作家的出现，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所指出的，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了（不仅男性享有性自由，女人也将享有。”[23] 但是， 综上所述，坏女孩的出现以及其作品的流行，与其说是西方女权主义在东方打胜了一仗，毋宁说她们更标志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已成功入侵共产主义中国，并在其红色土壤上成为主流。

[21] 参看 www.women.sohu.com/58/22/blank215572258.shtml, 页 4。
[22] 同上，页 3。
[23] 同上，页 2。